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片面吸取苏共教训的后遗症

中共总结苏共亡党亡国教训的局限性，会产生什么后果呢？它所作的改革和调整，是否足以避免重蹈苏共覆辙呢？

在百年巨变中，组织化程度高是中国的一大优势。改革开放中这个优势发挥在经济建设、法治建设、治理环境、改善民生、应对危机等上面，使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都很强，对民间诉求的反应比较灵敏；老百姓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，在迁徙、择业、居住、旅游、言论等方面有相当的自由；反腐败得民心；再加上日益发达的维稳机器，这些都决定了中共江山稳固。

但中国制度的水平并不高，尤其在微观机制上。目前中共拥有的还是个干事的体制，而且是干国家层面大事，而许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，正在或者已经沦为扯皮的体制。西方国家长期不改革，中国就会长期居于优势地位，水平不高也过得下去。但民族复兴、大国崛起要求高水平的文明，这就需要大胆改革创新。

中共尽管打出了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的大旗，但并未真正从理论和制度上解决路线问题，一直不是被向左拉就是被向右拽。

中共可庆幸的是，近些年来右的威胁可以说基本解除了。六四那种群众性的诉求基本没有再现，西方期待的和平演变也没有出现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老百姓对现状基本满意——国家在不断进步，生活在不断改善，爱国热情不断高涨；另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重重危机，使西方模式失去了吸引力。

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了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说法。一些世界性的共同诉求，如贫富不均，公平正义等，引发的不是西化而是向左的回归——“公知”成了过街老鼠，“小粉红”成了新时髦。这是因为在现体制下向左转感觉驾轻就熟，毫不违和，而且安全，但却带回来了一系列老问题。

张冠李戴

对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，中共近些年来不再归功于对旧体制的改革，而是归功于它的延续，这是左转气候下的一个明显的误判。

仔细分析一下，这些年施政的主要内容，如恢复马克思主义信仰，加强纪律、规矩、忠诚、收权、反腐，强化市场监管，做大做强国企，去GDP主义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，加大信息和言论控制，清除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上的影响，扩大党组织的覆盖率，推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，在中国经济奇迹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

恰恰相反，中国经济是在它们的弱化中起飞的。将这些当作制度自信的根据，显然是张冠李戴或偷梁换柱。这并不是说这些措施错了，它们也许很必要，但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以及能否保持中国的竞争优势，都还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，不能根据这些就下结论说找到制度自信了。

个人崇拜

苏联体制是为个人崇拜而设计的：它必然导致个人专断和所有人都向上讨好的行为模式。它天生缺少对大跃进和文革那样大灾难的熔断机制，也没有中国古代谏议机构对皇权的那种缓冲。如果最高领袖一意孤行，就可能酿成民族灾难，而绝对权力正是执着和执迷个性的温床。

现代化政治中卓越领导人不必是圣人，比如美国国父们酗酒蓄奴，打架斗殴，放荡形骸；这些大家都知道，但掩盖不了他们的历史功绩。从凡人中造神才是身败名裂的捷径。

“精神原子弹”

在一个拜金充斥的社会里，重新强调精神的东西一定会引起共鸣。但把握住精神力量的度以及将它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，是个巨大的挑战。“精神原子弹”的年代离中国人还不太远，许多人仍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记得它造成的灾难。

那是个爱憎分明走极端的年代，天天都是伟大的斗争——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全面内战打得天昏地暗；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艰苦奋斗到没饭吃；唱语录歌，跳忠字舞，早请示晚汇报；全国一言堂，一句顶一万句，政治正确像瘟疫一样蔓延；揭发告密，思想扭曲，人格残缺，到头来一枕黄粱梦初醒。谁也不能保证疯狂的岁月不会再来：大批判的精神、不包容的态度、无理性的行为似乎借网络暴力还魂了。

运动模式回归

共产党组织脱胎于大革命，运动是它的第二本性，它完成任务习惯于启动运动模式。群众运动对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很有效，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就容易酿成灾难，运动可以将人性、道德底线、文明积累，制度和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扫而光。比如红卫兵的狂热、残暴和对文明的摧残，使文革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，包括起码的礼貌。

不泄愤，不立靶是形不成运动的，今后树谁为靶子——马云？建国以后批斗的对象都平反了，无论是地富反坏右，还是走资派、臭老九。运动的结果，往往不是始作俑者期望的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建设性场景，而是“众人放火冲天烧”的破坏性局面。它给人性中的恶，提供了堂皇的借口和广阔的空间。

微观统治复辟

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队伍壮大，但列宁式政党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松散的党。它的组织严密，追求权力垄断，对周围的一切都有抑制作用，很适合计划经济。在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体制下，党组织实行的是微观统治，对单位成员的控制是全方位的，吃喝拉撒都管，极大地压制了个人的空间和经济社会的活力。

市场经济对中共基层组织造成了很大冲击，党

员降为职业之后的第二身份，对党组织的忠诚打折扣了，但这也是经济起飞的前提。中共本应该围绕着保护和进一步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，来设计新组织模式，但惯性思维和对失控的焦虑，使它千方百计要恢复旧模式。近年来除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外，还大力推动党组织对经济社会的全面覆盖和渗透，包括私企、外企和民间团体。

执政党的组织渗透到任何地方，都会自然而然地争夺权力和资源。这种旧模式党建很少考虑同市场经济和企业的衔接问题，形成对市场活力的压抑，最终有可能通过微观统治的复辟，将旧体制的僵化问题带回来。

历史虚无主义

片面吸收苏共亡党的教训首先表现为：为了维护党的威信而拒绝彻底、公开地清算文化大革命，躲避甚至粉饰那段历史。1981年官方对文革的结论强调两点：“极左”和“天下大乱”。现在“中国不能乱”仍然是底线，但“极左”逐渐不提了。薄熙来在重庆“唱红打黑”以来，“小文革”的高潮在各地不断涌现。“毛粉”将文革理想化、时髦化，搬出文革的口号、理念和行为方式来当政治武器，对文革大搞历史虚无主义。

不允许讨论，大搞思想灌输，粉饰甚至编造历史；一切定于一尊，以官方口径和提法为准；以为封杀不同意见就天下大吉，这些都是政治前现代化和不成熟的表现。对建立在自己成功实践上的理论创新无能、无信心或无胆量，于是只好退缩回旧体

系的舒适区，得过且过。

苏东波机制仍在

苏东波的一个关键史实是，它的爆发是全民性的，反对的是整个体制，而不是某些人物或某个政策，其实质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反判，而不是对西方民主的拥抱，因为在铁幕后面的人们对西方体制知之甚少。

将苏东波归因于“思想搞乱了”是误诊，因为思想乱了恰恰是官话一言堂的后果：长期历史虚无主义使正统失信于民，造成逆反心理：一旦发现官方撒谎了，就连真的也不信了，将当局一概视为骗子。人们还记得六四广场上官煤员工打出的横幅：“我们撒谎了”。中共宣传机器的惯性使它很容易向旧模式回归，再启苏东波机制。

重苏共、轻中共的教训

以上问题有的已经很明白了，有的刚露苗头，有的正潜伏着，但出现是早晚的、顺理成章的，因为目前的体制对左潮毫无抵抗力——宁左勿右仍然是体制内人屡试不爽的护身符。邓小平吃透了这个体制才有了他的警句：“要警惕右，但主要是防左”。中共花了大气力总结苏共亡党的教训，却似乎忘了自己的惨痛教训。同前苏共的保守主义不同，中共历史上主要是极左的错误，带来的灾难也比苏联深重，不应该好了伤疤忘了痛。

中共长期受困于左右之争，是因为两头都有成套的理论体系，有话语权的优势，而中间地带缺乏成熟理论带来的定力和方向感，常陷入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境地。理论和体制创新，建立起可靠的对左防护墙，乃当务之急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